

真实与幻影

ZHENSHIYUHUANYING

黄波◎著

国记
民忆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真实与幻影：近世文人之心灵画像 / 黄波著. —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5
(民国记忆丛书)
ISBN 978-7-5399-4358-9

I. ①真… II. ①黄…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45979 号

书 名 真实与幻影：近世文人之心灵画像

著 者 黄 波

责 任 编 辑 孙金荣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邮编：210009

集 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05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4358-9

定 价 27.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窥破文字的迷障（自序）

我曾经应约为《杂文选刊》写过一篇题为《窥破文字的迷障》的所谓“创作谈”，文章很短，先录在下面：

自有文字以来，人类文明史渐趋辉煌。但文字这东西传承文明，也同时在设下无数迷障。这迷障有社会、文化、经济等各种原因，也有无心与有意之别，但最重要的一点，当“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成为一种奢侈品甚至被视为某种忌讳时，文字的迷障就不期然而然地降临了。

我喜欢去努力窥破文字的迷障，《十字坡上的冤魂》和《“一生都像是在否定里生活”》是两次尝试。对国人那种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英雄观，我困惑已久：十字坡上快意恩仇的武松、张青让人迷狂，为“英雄”衬色、垫底的十字坡上的冤魂却无人注意，这是一种怎样的国民性？于是我写了一组关于《水浒》的文字，总题为《说破英雄惊杀人》，陆续发表后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包括《文汇报》笔会版等多家媒体为这组文字开辟了专栏，网上也转载如潮。我对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境遇和心态感兴趣，搜集了许多史料，也写下了杂文、随笔多篇，《“一生都像是在否定里生活”》则是我这方面探究的一个小切口，通过冯至先生这一个案，我希望能够让人思索：为什么自轻自贱会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种生活常态？究竟是什么力量逼使中国知识分子自轻自贱？这种自轻自贱与哲学上的“否定”有何区别？它对国家民族的危害又在哪里？……从文章发表以后的反响看，部分实现了我的目标，我为作者与读者之间的默契而欣慰。

文章中提到的《说破英雄惊杀人》，是我十几年来阅读《水浒》的一点随感，现已结集成书，已于2007年12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而“我对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境遇和心态感兴趣”云云，这种兴趣的一个远非丰茂的结果就是现在这本名为《真实与幻影》的小书。

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走过怎样的道路，我相信拿起这本书的人不会比我知道的少。我所做的工作是，对各种资料，哪怕是非常普通极易见到的资料，进行比勘，从中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说到底，仍然是在努力“窥破文字的迷障”。我的企愿是，如果一篇文章能够发现一个问题，积累得多了，庶几我们就能够回答这样的大问题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命运昭示着什么？鉴往知今，当下的知识分子应该如何自处？……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奢望，实际效果如何，请读者批评。

研究近现代知识分子的人很多，在写这篇序言的时候，我不能不心怀感激地提及这样一些草路蓝缕者：谢泳，许纪霖，丁东，范泓，傅国涌，张耀杰……不敢自承为他们的“后劲”，因为除了个人天分的限制以外，客观条件也是一大要素。探究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工作中，第一位、最基础的工作是尽可能多地搜集原始资料，但说了也许读者会不相信，本书所引用的参考书目，没有一种是从公共图书馆中得来的。我原在一个内陆的小城，那里的藏书似乎不比我的私家藏书多多少，现在我暂时栖息于一个据称要向“国际大都市”迈进的城市里，可这里的图书馆，我仍然是进一次就会失望一次。因此，我虽然利用网络，相对丰富了我个人的藏书，使资料运用中还不致捉襟见肘，但“研究”二字，是万不敢当的，只好说是个人对那代知识分子的匆匆一瞥罢了。自然，这匆匆一瞥的缺陷几乎不言而喻，也许唯一可以自慰的，这一瞥还不失个人化，此外，在一瞥中我坚持知人论世，坚持对那一代知识分子作“同情之理解”。

本书中结集的文字都在国内媒体公开发表过，不弃涓埃大度接纳它们的包括《随笔》、《书屋》、《博览群书》、《东方文化》、《社会科学论坛》、《南方周末》等很有尊严的媒体，容我在这里对这些报刊（有的可能已成历史）和编辑表示敬意。由于各种原因，有的文章发表时或小有删改，现在结集，

悉依我写作时的原貌，当然，文责自负。

自小读书就不喜欢长长的序言。轮到自己，却不知不觉间啰啰嗦嗦了这么多。最后，对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我的朋友和师长，还有家人，真诚地道一声“谢谢”！这是我的第三本小书，但愿与前两本相比，它能带给你们稍稍多一点的阅读快感。

2010年12月于宜昌

目录

001 | 窥破文字的迷障（自序）

第一辑 时代与人

003 | “平生自问尚无羞”——书生翁文灏

013 | 在孔子与罗素之间——漫说张申府

018 | “书生谋国直堪笑”——关于张东荪

025 | “丁在君这个人”

035 | 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命运——以胡先骕为例

045 |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两个年头——读钱理群、傅国涌的两本书

051 | 一个没有失败的“失败者”——“民国宪法之父”张君勱

061 | 说到“英雄”一涕然——陈其美及其时代

073 | 真实与幻影——朱自清的1948年

079 | “北京政变”中的胡适

085 | 晏阳初：不同的视角

目录

090 | 秧歌与大变动时代的知识分子

102 | “昔时赵李今……”

107 | 从政治学家到红学家的吴恩裕

第二辑 性情与命运

115 | 杨度：市井有谁知国士

125 | “知堂谈吃”有新篇

128 | 唱样板戏的俞平伯

131 | 残缺的《最后一次讲演》

134 | 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读《沈祖棻诗词集》

140 | “政治装饰品”的心曲——《蒋廷黻回忆录》、《何廉回忆录》读后

145 | 新闻史上的“范长江现象”

150 | 历史的误会——作为“战国策派”文人的陈铨

158 | 闻朱关系考

目录

167 | 寂寞一诗翁：重说柳亚子

178 | 关于晚年周作人的两三件事

第三辑 现象解读

185 | 独立人格是怎样失去的？

189 | 模糊的“思想受难者”形象

194 | 宽容的底线及其他——再谈“思想受难者”的施难等问题

198 | 接受忏悔，我们准备好了吗？

202 | 重读吴晗的杂文

208 | 如果哈耶克读民国史

211 | 要不要“回到傅斯年”？——“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斗争”的再解读

216 | 托克维尔的启示

221 | 从梁启超家书看王国维之死

227 | 世运变迁与文人隐疾

第一輯

时代与人

■『平生自问尚无羞』——书生翁文灏

■在孔子与罗素之间——漫说张申府

■『书生谋国直堪笑』——关于张东荪

■『丁在君这个人』

■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命运——以胡先骕为例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两个年头——读钱理群、傅国涌的两本书

■一个没有失败的『失败者』——『民国宪法之父』张君勱

■说到『英雄』——涕然——陈其美及其时代

■真实与幻影——朱自清的1949年

■『北京政变』中的胡适

■晏阳初：不同的视角

■秧歌与大变动时代的知识分子

■『昔时赵李今……』

■从政治学家到红学家的吴恩裕

“平生自问尚无羞”

——书生翁文灏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政坛上，涌动了一股“学者从政”的小小浪潮，著名者如名满天下的胡适，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史学家蒋廷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主任、经济学家何廉，而其中官位最高、经历最曲折者当属地质学家翁文灏，他做到了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高位，晚年又翩然海外来归，以政协委员终老。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论及应该如何团结“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时，专门点到了翁文灏，说他是“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算是未盖棺而论先定。

“翁文灏（1889—1971），浙江鄞县人。字咏霓，早年留学比利时，获物理及地质学博士学位。1912年回国，任农商部矿政司司长等职。1914年任北京政府地质调查所矿产股股长等职。1918年代理所长。1922年起任清华大学地质系教授、主任，曾先后出席太平洋科学会议、国际地质会议等，首次提出燕山运动在中国的存在及意义。1931年，一度代理清华大学校长职务。1932年被国民政府委为教育部长，辞未就。1935年初，出任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1937年4月，以中国特使团秘书长身份，随孔祥熙到英国参加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典礼。6月，访问德国，旋赴苏联考察。1938年1月，任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工矿调整处处长，负责军需生产。1943年9月，主持同美国战时生产局局长纳尔森及赫尔利关于中美两国军事经济合作计划会谈。同年11月，工矿调整处改称战时生产局，兼任局长。1945年当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任行政院副院长。1948年5月任行政院院长。11月辞职。1949年曾任总统府秘书长。离职后，于1950年由香港去法国讲学，次年从法国经香港回北京。后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台湾和平解放工作委员会委员。

1971年1月17日，在北京病逝。著有《中国矿产志略》《甘肃地震考》《椎指集》等。”¹从这个辞条可以看出，翁文灏的人生在1935年判然两途。作为学者的翁文灏，曾在近代中国大放异彩，手头有一本《翁文灏选集》，书后附有《翁文灏在我国名列第一的贡献》，计有十一项：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中国第一本《地质学讲义》的编写者；第一位撰写中国矿产志的中国学者；中国第一张全国地质图的编制者；第一位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地质会议的地质学者；……²对作为科学家的翁文灏，如今的评价已趋一致，尤为难得的是，他在科研方面的组织和管理上的才能也早有定评。中国近世文人学者多多少少都与政治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而以翁文灏的天性，他本应是一粹然学者、书生。他虽然也被视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和丁文江等这批朋友不同，他不仅有浓厚的专业关怀，而且骨子里是相信科学救国的。职是之故，翁文灏先后两次婉拒了国民政府的征召。然而对近世知识分子，政治这东西简直就是胡适所说的“不要儿子，儿子来了”。一个对做官没有兴趣相信科学救国的学者最终还是走上了政治前台，甚至一发不可收，在一个被世人目为腐朽无能的政府内阁中挂了头牌。回首前尘，其中可有几分宿命的意味？

翁文灏命运的转折缘于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1934年农历正月初三，翁文灏赴长兴调查石油的途中，因所乘汽车猛撞到桥栏杆上，汽缸爆裂，致头部受重伤，完全昏迷，病势极为凶险。蒋介石得报后，命令医院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并延请国内名医会诊，接来家属照看，终使翁文灏转危为安。说到翁、蒋的关系，还要追溯到1931年。鉴于日本咄咄逼人的威胁，蒋介石在钱昌照的建议下，决定在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内成立一个秘密机构——国防设计委员会，按照钱的设想，此处的“国防设计”是广义的，不仅有军事、外交，还包括教育文化、财政经济、原料及制造、交通运输、土地粮食及各种专业人才等各个方面，钱按照蒋的意思拟定了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名单，这一名单和以往南京政府的官僚机构有极大的不同，名单中人大多未曾在南京政府中任职，有些甚至是对南京政府持批评态度的人士。这份名单使一大批中国知识界、实业界的精英人物进入了蒋介石的视野，翁文灏

也列名其中。1932年春，蒋介石授意钱昌照分批安排名单中人与自己会见或讲学。翁文灏遂于该年夏天应钱昌照之邀上了庐山牯岭，与蒋有了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蒋、翁二人不仅都是浙江人，而且蒋的老家奉化与翁的老家鄞县过去同属宁波府，这种地缘关系可能淡化了初次相交时的距离感。两人在会谈中有一个中心议题，就是如何应对日本迫在眉睫的威胁。翁文灏说，如果以蒋为首的政府能够负起抗日保国的重责，必能取得全国拥护，而且因了确定的中心目标，经济建设等具体工作也易推进。谈到自己，翁文灏说他对政府工作并无专长，“惟历年调查矿产，于主要富源，尚知梗概，因并告以我国自然资源分布情况”。³蒋顺着翁文灏的话头，托出了自己和钱昌照准备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的设想，并趁热打铁请其担任委员会中负实际责任的秘书长一职（蒋自任委员长）。蒋的这一要求使毫无从政准备的翁文灏措手不及，他表示自己可以担任委员，但秘书长一职实难允诺，蒋却坚持己见，几经反复，最后以双方妥协达成一致：翁文灏接受秘书长的职务，但并不到职任事，仍居北平继续主持地质调查所工作，由钱昌照担任国防设计委员会副秘书长，负责委员会的实际工作。⁴时隔不久，南京政府再次改组，10月28日任命公布，教育部长竟然是事先毫不知情的翁文灏。翁以继母病故要送其灵柩返乡为理由，上书南京政府坚辞未就。

蒋介石在考虑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人选时，为什么独独相中翁文灏？主因大概有二，一是作为学界名流的翁未加入任何党派和团体，无政治背景和派系色彩，既有利于和各界精英联系与合作，也便于蒋介石对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控制；二是国防设计委员会的针对性很强，但当时中日表面上还未正式全面决裂，翁文灏虽是名人但毕竟尚未在政坛上露过头角，由他任秘书长可以减少外界注意。当然，蒋、翁二人小同乡的关系也是个可以适当注意的因素。

回顾蒋、翁的关系，二人有一个逐步接近的过程。不论真假，蒋在二人的第一次谈话中慨然以巩固国防为己任，这给崇尚科学救国的翁文灏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影响了他此后的人生选择。翁文灏晚年回忆说：“那时我误认蒋虽是一个军人，但尚能认识保全国土的责任。即此误解，便成了我

走错道路的开始。”因了这种印象，一个是国内最有权势的人物，一个是学界清流，两种人物之间本容易产生的隔膜感就此消散，翁文灏虽然拒绝了蒋的征召，但在其内心里，对最高当权者的这种“知遇之恩”是否一定就无动于衷呢？大概是很难的。而等到一场车祸突来，等到最高当权者再施救命之恩时，像翁文灏这样受过传统处世哲学熏染的淳厚君子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已经是不言自明了。

1935年11月，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遇刺受伤，行政院长一职为蒋介石接任，蒋即着手组织自己的内阁班底。行政院的办事机关是秘书处与政务处，各设秘书长和政务处长主管行政院内日常事务，等于行政院长的幕僚领袖。蒋介石决定秘书长一职由翁文灏担任，而且不容翁文灏推辞。随后，翁文灏又向蒋推荐时为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的蒋廷黻担任政务处长。和翁、蒋同期在蒋介石内阁中任职的还有主长教育的法学家王世杰等知识界、实业界精英，一时被称为“人才内阁”。

进入政界的翁文灏素有清官和能吏之名。他在国民政府中先后主管过多个部门，且多系肥缺，而他自己始终保持书生本色，不贪不占，所负责的工作从来都是井井有条。在当时政要中，他的家风、门风也有着良好的口碑，子女全无豪门习气，翁文灏的次子——国民党空军上尉翁心翰更是拒绝了上级让他不上前线的好意，新婚刚满半年便壮烈地牺牲在了对日空战中。一向对国民政府官员持批评态度的《大公报》为此专派记者前去采访翁文灏，那位记者写道：“（翁文灏）谈起殉职的儿子时，没有叹息，甚至谈笑时全没有半点不自然……‘本来作战就是危险的，报国心切的人，在作战时死的机会更多。’说完，他淡淡地笑笑”。⁵表面的淡然更透出了内在的创痛之深，这种痛苦在给老友陈布雷的私函中表露无遗：“弟勉力公事，视若处之泰然，实则衷心创痛，非可言喻。吾国空军人员为数较少，死亡频仍，精华垂尽，不特第一家之苦，实亦可为大局忧也。”

翁文灏在国民政府中是少有的清廉正直之士，但这并不表示他是一个不知变通和从权的迂人，应该说其自有特具的处世和应变的手法。在一个像国民政府这样暮气沉沉的衙门中浸淫已久的人，当然知道要想做成某项

哪怕正当的事业，也难免要有一些妥协的。根据时人的记述，有两件事颇值留意，一件是蒋廷黻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记，当蒋廷黻任行政院政务处长时，蒋介石要蒋廷黻尽快提出改革中央政府的意见，“首先我向他口头报告我的拟议。他很高兴，要我正式提出建议。当我草拟建议时，南京有很多议论”，各个部门各色人等利益所在，对蒋廷黻的方案提出了各种要求。因为反对者太多，蒋为免夜长梦多，用最快的速度把他的建议稿满怀热望地交给了蒋介石，但最后的结果却是最高领袖把他调离了岗位。在这次机构改革的小小冲突中，翁文灏并未给蒋廷黻足够的支持，蒋说：“最后，连翁文灏都劝我不可操之过急”。⁶ 揆诸情理，以蒋廷黻、翁文灏二人相似的知识结构，翁当然理解蒋的改革方案必会有利于衰朽的官僚机构提高效率，更何况蒋的“入幕”还缘于翁的荐举呢？可是翁文灏此时不能不更多地考虑现实的后果，一个看似很好的方案如果注定执行不了，那又有什么用呢？后来接替蒋廷黻改革中央政府工作的正是翁文灏，看来在蒋介石眼里，翁文灏是个较能为各形官僚接受的人。在国民政府这样前现代色彩浓厚的政府里，过于锋锐未必有益。翁文灏在官场中的圆通在玉门油矿的开发上再一次得到了证明，当时负责勘探的孙越崎等人经和时任经济部长的翁文灏研究上报了开发计划，约需开采资金五百万美元，这份计划在行政院的会议中遭到了反对，出席会议的翁文灏见会场上反对的意见一面倒，多说无益，因而不言不发，但在会后，他却对失望至极的孙越崎讲了一番很有意思的话，“会上解决不了的事情，就要靠会下去想办法，我同你去见孔祥熙（时任行政院长），向他说明这份计划是你做的，你多向他说几句好话，大约就可以成功了。”孙越崎依计行事果然得到了孔的批准。出了孔府以后，孙还在为低头去求当时口碑甚差的孔祥熙而耿耿于怀，翁却说：“我们是为公又不是为私。大事成功了，还有什么难受？”⁷ 可以说没有翁文灏的圆通就不会有后来玉门油矿的成功。翁文灏的从政之路极为顺畅，最高当权者对他的“宠眷”始终不衰，其故安在？除了他的才干，和向来超然于复杂的派系纷争与人际关系以外，他处世的圆通、较有人缘也应该是一重要因素。从翁文灏的从政生涯中，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出他的确是一个人情和世务都极为

练达的能吏，另一方面也可窥见所谓“潜规则”在一个前现代政府里的无处不在。这好像翁文灏这样具备现代政治素养和行政能力的人，其实又何尝不是一种悲哀？

说翁文灏是能吏，是指他擅长处理一个个具体而微的行政事务。他是以从事科学研究的那种精细来做行政工作的，可是行政毕竟与政治不是全同，一个精细入微者可以是一个好的行政人才，却未必能成为一个有眼光的政治家。且不说翁文灏在政治生涯中的选择问题，仅从翁文灏对蒋介石及其政府的体察上，他就明显缺乏睿见。对蒋介石，翁文灏一直执著于知遇之恩和救命之恩，“入幕”之后蒋对他也优渥有加（他60岁生日那天，本人未声张，照常上班，而晚上蒋氏夫妇突然亲临翁府祝寿），他大概以为蒋是真正信任他的，似乎从未回头细想一下，在他的从政生涯中，究竟参与过多少党国机要？那个前现代政府里的各种最重要、最核心的决定，从来都是三五要人筹划于密室，最后由最高当权者拍板定案的，即使翁文灏做到最高行政首脑的位置，又怎样呢？他要做的只是将别人已决定好的东西用一种冠冕的形式包装一下而已。究其实质，位居国民政府行政院长高位的翁文灏和负责他办公室洒扫之责的人并无区别，都不过是这个政府需要的从事具体事务的公职人员。所以，那个同属“学者从政派”的著名经济学家何廉在失望之余说了句透彻的话：“翁文灏和我虽都在政府中位居高职，但比起‘圈内集团’来，毕竟还是外人。我们并非政府的里层人物，也非党的成员，我们不过是政府的‘装饰品’！我们从未能够搞清楚幕后究竟在搞些什么。”⁸

以翁文灏的性格，他即使对自己作为“政治装饰品”的角色有所体察，可能也不会介意的。许纪霖对此分析得甚好，“行政官吏所具备的只是工具理性，他们所关心的只是行政效率的高下，只为管理是否合理化负责”。⁹所以，像何廉犹能早早觉醒，而翁文灏尽管多次想从政治中抽身，却欲罢不能，反倒越陷越深，在众人皆知国民党政府势将倾覆之际，居然还会成全了别人的“拉郎配”，坐到了行政院长的火炉上。

翁文灏是事务之才，不论是在当年还是现在，似乎都无异辞。但一到

决策——仅仅是在经济事务的决策上，他的思路 and 选择便让人们的感受复杂起来了。1935年，原国防设计委员会易名资源委员会，隶属军事委员会，1938年又改隶经济部，由经济部长翁文灏兼任主任委员，这时的翁文灏已成为战时“总后方经济”的重要角色。而翁文灏的经济理论是什么呢？资源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吴兆洪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得很清楚：“翁文灏笃信孙中山的‘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的理论，他多次告诫资源委员会工作人员不许自己搞民营企业，也不得参加民营企业股份。……翁文灏和钱昌照的国营企业理论，有三个‘基本原则’：（1）中国经济建设，必须以工业化为中心。（2）工业化必须以重工业建设为中心。（3）重工业建设必须以国营事业为中心。”¹⁰……翁文灏等人这种过度依赖政府之力发展经济的思路后来受到了胡适的批评，1954年，接触了哈耶克思想的胡适在《自由中国》杂志的一次茶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发言中，借“一位朋友”的话说：“（翁文灏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依赖政府，靠政府直接经营的工业矿业以及其他的企业的。从前持这种主张最力的，莫过于翁文灏和钱昌照，他们所办的资源委员会，在过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国的工业矿业，对于私有企业蚕食鲸吞，或则被其窒息而死。他们两位终于靠拢，反美而羡慕苏俄，也许与他们的思想是有关系的。”¹¹胡适曾经推许翁文灏为“一国之瑰宝”，而此处的批评却似犁庭扫穴，颇为严厉，几近于思想清算。许多年后，当代学者谢泳又写了篇《胡适为什么要批评资源委员会》申胡适之说。面对这段公案，第一个问题是：翁氏后来的选择是否决定于他的经济思想？窃以为二者之间只有或然性关系的，因为有不少持计划经济思想的人并没有走翁氏后来的路这样的反例。第二个问题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对国弱民困外有强敌入侵的中国而言，整个工业和经济的建设究竟应否首先服从和服务于抗敌保国战争？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在亲眼目睹苏、德集权式经济模式巨大成就之后，翁文灏的选择就有了不得不然的合理性。如果资源委员会不按翁文灏的路子走会不会成效更大呢？这种假设并无实际意义，对前人也是不公平的，而有一点现在倒是清楚的，那就是在翁文灏等人的苦心经营下，资源委员会至少维持了经济的命脉，中国的工业没有因战争轰然